

一部厚重的《法国政治思想史》

并非洋洋洒洒，却是点点滴滴

揭示了浪漫法兰西一帮近代精英人物的思想轨迹
他们为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祖国提供的济世良方

这些轨迹和良方

同样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影响了他们之后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建构方向

郭华榕 著



法国政治思想史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人民出版社

法国政治思想史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整体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政治思想史/郭华榕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7-01-008673-6

I. ①法… II. ①郭… III. ①政治思想史-法国 IV. ①D09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019 号

法国政治思想史

FAGUO ZHENGZHI SIXIANG SHI

郭华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7.5

字数:707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673-6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法兰西，这是世界上受到较多关注的一个国家。为何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她的突出的吸引力。她有着秀丽的景色、激情的居民和悦耳的语言，她的多次革命曾经震撼欧洲与影响世界，政治制度经历了变易和创新，文化艺术至今仍然显示着力量。与此同时，她的政治思想也不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笔者曾在另外的著述中探讨法国的文化艺术和政治制度。^{〔1〕}现在通过本书，企求将法兰西的政治思想尽可能如实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尤其近代，法兰西的政治思想发挥着显著的活力。此种活力大致包括多样性、针对性与深刻性等内容。

多样性在大自然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特征，近代法国社会以其政治思想的多样性也证明人类社会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由于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法国人之间的差异、阶级阶层与群体利益的悬殊、政治活动参与状况的区别等原因，政治思想出现了众家争鸣的局面。当人们争论某一个问题时，赞成和反对皆属常态，另外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程度不同的变易。可以认为，除屈指可数的历史转折关头外，法国人或法国的政治组织往往难于达到异口同声万众一心的水平。人们为着各自的利益，抒发政治思想，其目的在于获取新水平上的利益。布罗代尔出生

〔1〕 请见拙著《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法兰西文化的魅力》（三联书店—199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以及若干论文。

于洛林，他特别注意有关特性的思考与研究。他表示：“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不要忘记法国的多样性’。”〔1〕

法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多样性，通过各种政治思想流派的产生与活动，陆续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6—17世纪，面对封建纷争与需要大力增强君主权力时，“纯粹的”绝对主义曾有效地成为占据优势的政治思想，也即官方的政治思想。稍后，中央集权逐渐陷入困境，“开明的”绝对主义随之而起，人们暴露社会丑恶维护人间正义。他们呼吁宽容，提出妙计良策，企图继续支撑君主制大厦。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统主义思想反映时代变革的痕迹，表达若干人士企图部分复旧的心态。正是在此前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汹涌澎湃的思潮冲击着社会，由此产生了君主立宪主义、温和的或激进的共和主义等思想。我们还应看到，山岳主义（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政治的天主教主义、工团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它们先后地汇集在那百余年的岁月之中。

法国近代政治思想以它的多样性引起世人的关注。多样性还包含着不同人士的预见能力、思想家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那些认真钻研问题与深刻思考的人士中，不时出现警世言词。他们的思想可能不为当时社会主流群体所接受，他们可能心怀不同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往往以石破天惊之词预告社会演变的前途。1749—1750年巴黎发生骚动甚至街垒冲突，此时达让松侯爵（1694—1757）如此记载：“无论走到谁家，都能听见对于国王及其政府的咒骂……所有的等级都感到不满。这一切都是导火索，愤怒能变成暴动，而暴动能变成真正的革命……不是法兰西，而是政府处于危险之中。”1764年，伏尔泰看到了“一个必然来到的革命的种子”。“年轻人真是幸福，他们将见到美丽的东西”。〔2〕

1848年革命是法国历史中的大事。1843年，拉马丁预言：“我坚信，

〔1〕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与历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0页。

〔2〕 波尔什涅夫等编：《新编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卷，第272页。瑟诺博斯：《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4页。

五年之内我们将经历大革命。”托克维尔关于 1848 年革命的预言较为著名。该年 1 月 29 日，他在众议院发表演讲：“人们说目前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不曾发生暴动。人们说社会上没有物质方面的混乱，我们距离革命还相当遥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向你们指出，我认为你们弄错了。毫无疑问混乱不是事实，但是它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人们的思想。”他呼吁关注“工人阶级”的“政治热情”。关注一种“思想”或“舆论”，“它们不仅要推翻法律、内阁、整个政府，而且要推翻整个社会”。“我不知道他们将于何时与怎样导致革命，但是它们或早或迟将导致可怕的革命。”“先生们，我深信不疑；我想我们睡在一座火山之上。”〔1〕托克维尔吐出这些惊人之语时，距离二月革命的爆发为时不足一个月。

上述数人对于 1789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预言已被后来发生的事实证实，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载入了史册。法国政治思想的预见能力在现代也得到延续，典型的例子就是吕西安·费弗尔的《莱茵河》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虽然莱茵河有着“屠杀和战争的历史”，但她是一条“欧洲的河流。”“这是一条纽带，而不是一条鸿沟。”这是“一条联合各个民族的河流”。〔2〕该书于 1935 年公开出版，作者反对欧洲内部冲突，当代的欧洲联合证实了他的预见。

独立思考者敢于提出问题与交流思想，这是对于多样性的真正认识，也是其他人理解多样性的表现。法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交流始终存在，只是很少将它作为一类客观现象加以深入研究。

思想交流方面，孔多塞显得比较突出。他接受了达朗贝尔的若干影响，如对于权贵、金钱、贫困等的看法。他与杜尔阁是忘年之交。1770 年，孔多塞与达朗贝尔两人来到安省的费尔内，数日内他们在此与伏尔泰交流各自的见解。“三人在政治和哲学问题上取得一致，就像他们达成了一项在观点上互相支持的秘密协定。他们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直至

〔1〕 François-Georges Dreyfus, *Histoire de la démocratie chrétienne en France*, Paris-1988, p. 44.

Alexis de Tocqueville, *Oeuvres complètes*, t. 12. *Souvenirs*, Paris-1964, p. 37-38.

〔2〕 吕西安·费弗尔：《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778年伏尔泰去世。”〔1〕

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政治思想的交汇创造出奇迹，原先深受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与新雅各宾主义影响的公社委员们，不论主观意愿如何，通常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政策。此时，他们既摆脱有关思想流派对于自身的束缚，也接受不同流派的某些思想及其措施。交流不仅为思想沟通提供了良好条件，也对联合“作战”与实践其政治思想起着促进作用。交流是多样性的一种较高层次的表现。

法兰西的各种政治思想有着明确的针对性。近代是法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的时段，近代政治思想充分反映那个时代的特征。在那些年代，法国社会的矛盾多次达到尖锐程度，人们的社会处境和切身利益陷入明显的反差之中，压力与反抗不时震动着人际关系，若干问题成为当局治理国家的要害，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们敢于直接面对国计民生的难题，揭露时弊与抨击官疡，这些人的目的在于改变现状与获取权益。绝对主义、君主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波拿巴主义、工团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等皆是如此。就个人而言，贝尔与伏尔泰对于宗教与教会的态度可以作为典型。贝尔反对信仰的至高无上，指出“不要去尝试理解神秘的东西”，“如果你能理解它们的话，它们就不再神秘了”。“谁人不了解荒谬性是神秘之物的基本成分呢？”〔2〕对于伏尔泰而言，天主教教会是“迷信的恶魔与狂热的多头蛇”。尽管贝尔仅仅表达了怀疑论的看法，伏尔泰也非无神论者，但是他们的上述言论具有一个共同点，面对当时事关重大的社会课题，直接指向目标，抨击神秘论与天主教教会。

除去揭露与抨击之外，设法解决矛盾也体现出法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针对性。众所周知，揭露弊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则相当困难。为了真正地调整矛盾，必须提出恰如其分的方案，它们只有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当

〔1〕巴丹特：《孔多塞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30、37—39页。

〔2〕《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编写组，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24页。

时社会发展的水平，才有可能由思想变成现实，政治思想的针对性才是有的放矢。为了巩固绝对主义的王权，博絮埃提出“政治必须遵循《圣经》”。布瓦吉尔贝尔建议进行税收改革，促使绝对主义演变成“开明的”政治。依照贡斯当的理解，个人自由与宪法的结合将导致君主立宪制，既避免民主共和也防止专制暴政。布里索心目中的“统一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在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岁月中影响广泛。山岳派以“总动员令”调动全国力量，得以捍卫大革命。拿破仑一世自称是“革命的救世主”，他的确挽救了陷入困境的法国。由于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法国近代不同时期的主要的政治思想原则上得到实行，尤其共和主义与波拿巴主义曾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时，还有一些寻求解决难题的思想与方案。例如较早时，奥林普·德·古日大胆提出“男女的社会契约”（新的婚姻协定）。中期，傅立叶精心设想“法郎吉”。后来，索雷尔大力宣传“总罢工”等等。这些思想包含着改造社会的愿望，它们程度不同地具有针对性。

法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又一个特点在于它的深刻性。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流派、一类彼此相联的思想，通常都是以某种重要社会矛盾为背景，反映某些社会群体的要求。某一种思想的成熟程度，它的处理社会难题的能力，它的成败，关系到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关系到重大社会利益的保障或获取。因此，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努力使有关思想尖锐与透彻地发展，将有关方案阐明至极点。同时，凡是重要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引发相关利益的激烈冲突，这种状况使得争论的双方皆力求在思想上明确瞄准对方与彻底战胜对手。此种目的经常使人们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尖锐与透彻的政治思想在法国不是罕见的现象，布里索、罗伯斯比尔与贡斯当等人在这方面颇有建树。布里索于1780年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权，这就是盗窃。”罗伯斯比尔认为“大革命是自由抵抗自由之敌的战争”，必须建立“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所以需要非常行动，正是因为它处于战争状态。”贡斯当强调个人的意义，主张个人胜过权威与民众，指出“个人应自豪地与珍惜地索居于自己权利的堡垒之

中”^[1]。所有权等同盗窃、“革命政府”必须建立、个人的权利如同一座城堡，这些思想超出当时一般思想的水平。此种尖锐透彻的思想是法兰西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冲突往往能够达到比较彻底结局的原因之一。

人们不仅应该善于发现“美”，也应该善于发现“丑”，因为它们同时存在，互为补充。当我们考察法国政治思想时，必须尽力保持头脑的冷静。我们看到它们的长处，这是主要的，但是它们也包含着不足与缺陷。长处与短处都是那些政治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内容。就缺陷而言，既有过分侧重理论务虚，也有极端化的认识和对于宽容的否定。

人们对于启蒙运动充分肯定，认为它曾反对当时的教会和神学、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它求助于理性，要求建立“理性国家与理性社会”。这是与资产者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及其基本原则，是一场“哲学革命”，它成为18世纪“政治变革的前导”。唯物主义“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2] 这些评价无疑正确，与此同时还有若干问题需要探讨。这是一个“哲学体系”，它未曾给那些领导大革命的人提供一种比较完整而具体地指导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的艺术。法国人揭竿而起打击敌人，但谁是真正的敌人？敌我之外是否还有朋友？他们渴望平等并且身体力行，但是财产可以任意触动吗？整个城市可以“摧毁”吗？公民都必须共吃“平等餐”吗？栽种了“自由树”便能安享自由权吗？那些先后领导过大革命的人们，米拉波、巴纳夫、布里索、罗兰、罗伯斯比尔、丹东与圣-茹斯特等人所最为缺乏的，正是具体指挥革命的领导艺术。

如果与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互相比较，领导法国大革命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乌托邦资本主义”的困境，陷入了政治思想的困境。列宁

[1] Emile Lousse et Jacques de Launay,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1776-1993. Genève-1973. p. 337.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8—41、295页。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9页。Marcel Pr  lot, *Histoire des id  es politiques*. Paris-1977. p. 451.

[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710页。

陆续发表三部著作,《怎么办?》(1902)、《进一步,退两步》(1904)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阐明一系列问题,如推翻沙皇专制、党的领导作用、自发性与革命理论、纪律与行动、民主集中制、武装起义、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等,从而为革命打下思想、组织与策略的基础,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因而掌握了具体指挥革命的艺术。毫无疑问,随着政局的发展,列宁也曾及时做出调整。

大革命的领导者们曾经不同程度地接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憎恨旧制度,仇视一切革命之敌,渴望创建新的社会政治机制……但是对于革命的顺利发展而言,除了满腔热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握革命方向、制定重要政策、组建革命机构、选择合适的领导人才、保证民众的日常生活、区分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考虑国内外局势,并且恰如其分掌握打击的限度,以及在适当时候改变策略拨转航向。由于缺乏具体地指挥革命的领导艺术,经常出现自发性与盲目性,矛盾不分主次,暴力任意实行,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如家庭出身、地区特点、教育状况、个人性格、对于压力的承受能力、对于局势变化的判断能力等)不时发挥作用,影响了革命的进程。

此前,法国的政治思想未曾提供有关方面的具体指南。1793年12月25日,罗伯斯比尔在讲话中坦然承认:“革命政府的理论与导致此种理论的革命相同,都是新鲜之事。在政治作家的著作中无法找到此种理论,他们绝对未曾预见到这一场革命。”1794年2月5日,罗伯斯比尔再次表示:“在此之前,在那狂暴的情况下,指导我们的是对于幸福的热爱和对于祖国需要的理解,而不是正确的理论与明确的行动准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确定这些东西”。^[1]他所讲的情况确为实情,人们各自按照心里设想的新社会图景来处理革命事务,此中各种乌托邦的成分相伴而生。当时与后来,在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高度评价的大潮中,人们很难意识到法国当时政治思想的严重不足。

近代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极端化和绝对化。法国历史上,

[1] 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Paris-1974. t. 3. p. 98, 110.

每当某些人陷入困境并且无法进行对等较量和自我解脱时，他们的基本权益无法获得保证时，绝望的处境与绝望的心态便驱使人们采取非对等的对抗形式，走向极端。垂死挣扎的愿望，理论上的片面性与行动的绝对化不时应运而生。当和平变革无计可施时，暴力便提上日程，反之亦然，它们是一对孪生姐妹。

极端化是一种常见现象。山岳派在当时情况下达到了一个特殊的思想境界。罗伯斯比尔宣布：“在共和国里，除了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们以外，没有公民”。圣茹斯特表示：“敢干，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一切派别都是罪犯，因为他们企图分裂公民。”国民公会曾经决定：“夷平里昂城”，“摧毁所有富人的住宅”。甚至提出口号：“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1794年6月3日，《山岳报》报道罗伯斯比尔当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并加上如此按语：“演说者的每一个字抵得上一句话，每一句话抵得上一篇演说辞”。后来，激进主义在此方面也有所表现，克勒孟梭宣称：“实际上，只有两个器官毫无用处：前列腺与共和国总统。”〔1〕

极端化意味着对于宽容的否定。当人们呼吁政治宽容时，那时社会上可能存在着专制，后者是一种政治极端化。“纯粹的”绝对主义思想家博丹论证了“君主的权力是最好的”，即绝对统治权，他应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在黎世留的心目中，“人民承受着国家的几乎全部的负担”。“应当将他们视同骡子”。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正是在此历史阶段，主要由“开明的”绝对主义思想家对“纯粹的”绝对主义思想进行抨击。1754年，杜尔阁出版《关于宽容的书信》。伏尔泰曾撰写以宽容为名的著述，如《论宽容》（1763）和《袄教徒或宽容》（1769）。大革命时期，面对山岳派“革命专政”的迅速加强，丹东改变政见，宣布“我请求珍惜人

〔1〕 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77页。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42页。Georges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1989. Edition 7e. p. 382.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66—267页。潘永年：《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北大出版社—1984年，第407页。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485页。埃尔朗热：《克勒孟梭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07页。

类的鲜血!”法国历史中,极端化与绝对化产生了恶果,这是不争的事实。近代,这个国家政治动荡过于频繁,无疑影响了社会的迅速和持久发展。

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至极端便是一例,戴鲁莱德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法兰西是“人类的捍卫者/她给人们以自由/给他们以独立自由的精神/光荣属于法兰西!”种族主义思想在戈比诺伯爵的著作中充分暴露:“西方,始终是世界的中心。”“唯一纯粹的种族是日耳曼人。”^[1] 极端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法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但是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绝对化和僵硬化,法德之间的仇敌关系依然又延续数十年之久。

不论长处与短处,它们都是法国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综合便是民族思考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一种表现。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很可能夸大这个民族的优点,反对法国的外国民族主义者很可能强调它的缺点。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有接受全部现实,进行辩证分析,以求做出恰当的结论。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民族或国家的思考能力十分重要,它的发展水平关系到该民族或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历史作用。法兰西正是由于她在近代的政治思想的活力,而在世界上赢得了关注。至此,笔者对于法国政治思想做了一个粗略的概括。

笔者牢记:这些政治思想并非凭空产生,也无法超脱于社会之上。人们为了思考,为了在精神王国里驰骋,首先需要衣、食、住、行,这就是历史的“世俗基础”。社会生活中,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在衣食住行之后,才能从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活动。法国政治思想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只有如此理解,当我们面对各种政治思想时,才可以避免唯马首是瞻或被生花妙笔所蒙蔽的危险。法国的政治思想不是神圣的,而是世俗的,它是受社会生活制约的历史现象。

[1] Paul Déroulède, *Marches et Sonniers*. Paris-1881. p. 28. Arthur de Gobineau,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1967. p. 446. Louis Delbez, *Les grandes courants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française*. Paris-1976. p. 156.

笔者撰写此书的起因是由于在法国讲授的一门课程。1988年秋,笔者曾为法国第戎布尔戈尼大学教授,任务是讲授“法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与“法国政治制度史”等课程,为期一年。后来,在巴黎与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继续有关法国政治思想的探讨。最终写成此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讲课时,每一种政治思想都有专门的分析论述。这些内容共约40万字。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只得将它们舍弃。

广而言之,我国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成绩,但是仍有若干不足之处,若干具体例子能够说明问题。坊间书刊对于启蒙运动的介绍容易落入俗套,开口伏尔泰闭口卢梭,说来说去多局限于数位在中国较有知名度的人士。实际上,启蒙运动的晚期不仅有一批思想家,而且他们多数人曾经投身大革命,亲自去实践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如孔多塞、沃尔内、迪皮伊等人。在史学研究中,对于某种波澜壮阔的运动的简单化与浓缩化,容易导致对于少数知名人士的神圣化,用少数去取代复杂的多数,仿佛他们几个人就是当时的一切,就可以指点江山或搅乱天下。

在法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对于法文原著的重视显然不够。若干专著所开列有关参考书目竟然未包括原著,而只见后人的研究著述。这里是指法国与国际史学,掌握法语又能见到原著的情况而言,于是经常出现人云亦云甚至误读误解。人们引用卢梭的一句话“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这句话“准确地”预告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必然到来。其实,卢梭那长达三页的文字只是一般地论述国家历史的“某些激荡时期”,革命如同某种疾病“能震荡人们的神经”。欧洲正在发生着社会大变革,例如彼得一世的革新俄罗斯等等。在这些话的前前后后,卢梭未曾专门讲到法国,更未直接预告1789年革命的爆发。^[1]

为了克服此类障碍,笔者利用在法国和意大利长期从事研究与教学的良好条件,努力寻找法国政治思想的原著,弄清作者们的原意,以便恰如其分地了解有关政治思想的内容。同时,也可防止简单化,如将卢梭的思想等同于罗伯斯比尔的行为、等同于山岳派专政,从而赋予世界意

[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62页。

义，如渲染乔治·桑浪漫的私生活，而不关注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如将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充当政治思想，如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完全错误。阅读法文原著才可能避免盲从。伊戈尔·康（Игорь Кон）老师近 50 年前的言论仍然记忆犹新。那时笔者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这位老师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时指出：“什么是盲从？当某个人站在（圣彼得堡的）杜奇科夫桥上引颈仰望时，他伸出手指着天空某处，并说‘你们看，你们看，那里有某种东西！’此时许多人走过来用目光在空中寻找……这些人是群氓，这就是盲从”。岁月如流，教诲难忘，笔者寻找法文原著的含义正是在于不愿充当盲从，而是努力了解有关思想的基本内容，原原本本地介绍它们，并加以适当的分析。

国际史学界某些同行强调“政治学说”，目的在于展示其重要性。对此笔者另有想法，“学说”指的是系统的主张与见解，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如此标准势必将若干不成体系但是影响颇大的政治思想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同时，政治学说经常由比较成熟的思想家精心构思与系统表达，而政治思想的表述人可以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活动家，例如政治家拿破仑三世与克勒孟梭，或知名人士戴鲁莱德等人。因此，政治“思想”远比“学说”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实际。

笔者设想主要介绍法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潮流和主义，而不是思想家与政治家们个人的思想史，他们个人的政治思想的变化轨迹应该由其他专著加以研究。例如罗伯斯比尔，他曾经历君主立宪主义、激进共和主义与山岳主义的思想发展，本书不涉及此人的思想演变，仅限于简单提及他的君主立宪与激进共和的历程，而重点探讨他的山岳主义政治思想，判断它是否具有经纶济世的能力。1789 年之际，米拉波、西哀耶斯、丹东与罗伯斯比尔都是君主立宪主义者，这些人在本书中将得到同样的对待。又如托克维尔曾赞成君主立宪，后来他带着民主思想去适应第二共和国，出任外交部长，他的温和共和主义思想将受到笔者的注意。

一个严肃的问题存在于国际史学界，人们受着民族、国家、地区与文化的或明或暗的束缚，有意无意地看重自己一方的事件和人物，甚至滥用“伟大”与“世界之最”等流行词语，从而损伤有关研究的科学含义。

在这方面，法国也不例外。应该看到，既然生活在“欧洲家庭”或“地球村庄”之内，既然人类社会发展确有它的共同规律，那么孤芳自赏与过度自爱往往说明：或是作者不知不觉地接受他人的流行论调，或是作者自恋心态的随意流露。笔者不敢放言高论，只求返本还源，实事求是地对待法国的政治思想以及它们的表述者。

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当此 21 世纪初之际，法国近代政治思想已是颇为久远的现象。16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有着当时的社会水平与社会矛盾、认识水平与表达方式。法兰西的大多数居民信仰天主教，那时博絮埃主张根据《圣经》治理国家并非奇谈怪论，更不同于当代世界具有宗教色彩的极端思想。18 世纪，“国际社会”的概念尚未诞生，“民族”的概念也还在模糊中孕育。那时，法国人很少讲到“法兰西民族”等等。从 1789 年开始，法国人的民族概念大体上等同于当今世界的有关概念，此种理解水平的代言人就是西哀耶斯，他认为“一种共同的法律和一种共同的代表制”造成一个民族。政治思想史中不同的词语可以有相同的意义，而相同的词语可能意义相异。例如，有时人们将共和与民主相等。又如对于“权力”的理解不尽相同。此外，对于“人民”（*peuple*）一词的理解，必须冷静与客观，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使用“人民”一词时，可能出现明显或不明显的差异，或如同 *multitude*（乌合之众）或如同显贵等级、高等法院与城市。若干含义与我们当代的概念存在区别，那时的 *peuple* 根据不同情况可以译作“民众”、“百姓”或“人民”，笔者对有关少数中译文稍作改动。

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是当时社会上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法国有不少响亮的名字，如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卡贝、德萨米、蒲鲁东、布朗基、路易·布朗、盖德、马龙与若勒斯等人，他们代表着当时五彩缤纷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流派，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不全是空想，而包含着若干有益的内容。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本书无法用一两个篇章简单介绍，而只有留待另一册著作去完成有关任务。

笔者还想说明一点，新概念新词语的产生是一种平常的现象，时髦

与流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理性和真理。近现代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与视同旗帜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其实早在公元前 400—前 300 年之际，已是不断使用的词语。例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多次讲到“广泛的自由”、“民主制度”、“民主国家”、“无政府主义”、“人民领袖”、“人民同意”。〔1〕为了着重说明政治思想，关于本书中涉及的人物，笔者限于篇幅仅简要地介绍他们的生平。关于他们的名字，也较多选择通用的一个。如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仅写为 François Guizot。又如 Louis Adolphe Thiers 仅写作 Adolphe Thiers。

近代的法兰西早已逝去，任何人也无力使它完全重现，但是通过对于原文原著的探索，或许还有可能大致地寻得这些政治思想的真正面貌。这就是笔者多年来的期盼，惭愧企鹤智用无涯，诚恳地盼望着读者与专家们的赐教。

〔1〕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332、333、339、340、345 页。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纯粹的”绝对主义.....	1
第 1 节 “天主给国王以绝对的权力”.....	3
3	“永不承认在天主之下有一个地位更高的人” (Philipp IV)
4	国家的产生 “是先于天主教的” (de Paris)
5	“法兰西王国的特殊标志” (Ferrault, Chasseneux)
5	“君主应摆脱法律的束缚” (Budé)
6	“必须由一个人统治” (L'Hospital)
6	帕基耶 (Pasquier)
8	“我的小小的共和国” (Pasquier)
8	“天主给国王以绝对的权力” (Pasquier)
9	博丹 (Bodin)
11	“君主制在共和国的各种形式中最为可靠” (Bodin)
11	“主权是共和国的绝对的与永久的权力” (Bodin)
12	“民众给予一个国民以太大的权力” (Bodin)